

# 巴金传

上卷

## 第一章四川老家

## 第一节书香门第

历史是很迷人的。如果你有兴趣研究每个家庭的盛衰，你就会觉得它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发生着十分微妙的关系。不管这个主人的心态，是顺应历史老人的步伐前进；还是根本不理睬时代的潮流，一意孤行，最终它们仍然还是要与历史携起手来，发生使人无可奈何的变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外有侵略，内有战乱，清代王室摇摇欲坠，无疑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川西平原，人们至今还不曾忘记九十多年前曾有一个端午节，在成都的东较场上，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有几千群众把四圣祠街的外国教堂捣毁了；接着而来的，则是红灯教和义和团的暴民们，相继围聚在成都城外，多次向城内作令人胆颤心惊的攻打；然后就在商业繁荣的成都市中心，有一些读书人，组织起一个由立宪党人控制的“蜀学会”，企图用“通经致用”、“托古改制”的办法，来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尽管这些都象征了时代已不能再是死水一潭的局面，而在成都城的北门，有个座落在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它的主人李镛，却还是按用祖宗世代传下来的规矩，在安排着他自己的家业，虽然他到最后才知道那原来不过是春梦一场。

这条正通顺街是一条石板路，虽有几家店铺，多半却是做官人家的住宅。李家在这条街上，占地面积最广，名声也很响亮。它的西邻是清末驻藏钦差大臣凤荃的住宅，后来租给英国作为领事馆；东面是赵姓公馆，再过去则是一个大仙祠，平时静悄悄，一到逢年过节，举行庙会，香火却很鼎盛，这条街也就热闹起来，甚至行人如织了。西面转弯街角，则有一家茶馆，是三教九流人物逗留的一个热闹场所，公馆里的人是很少在这里出现的，只有隔壁轿行中的那些贩夫走卒，才经常站在茶客旁边，听那些见多识广的人讲来自城内城外的新闻。

李公馆门前平时则是肃静无声，巍巍的高墙把深院大宅内的声音都围起来了。门前一对石狮子，也长年保持着沉默，好像它们也与这家的主人一样，无闻于世界的各种声响。门前还有两只很大的太平缸，经常盛满水，准备附近发生火警时救灾用的，由于多年这里保持着“太平”，这两只太平缸并不曾发挥过作用，倒是附近的那口双眼井，成了这个地段的标志，有时人们就把“双眼井”三个字来代替“正通顺街”这条街名了。

写在李家大门上红底黑字的门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八个大字，确实反映了主人李镛对国事家务的看法与愿望。在他心目中，这是个皇恩浩荡、国泰民安的时代，即使社会有些小的动荡，也不过少数盗匪一时作乱，不久总会由官府派出大兵把他们平定的。他从来不曾想到过皇帝有一天也会垮台，连他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家庭也会发生变迁。说实在，从李家的祖基来讲，李镛不但不是游手好闲的败家子，而且应该算个光采的接班人。他的祖父李介庵先随伯祖李秋门离原籍浙江嘉兴到北京，得交当时名士吴穀人、张船山；后又应聘山西马氏教馆，做了十余年的家庭教师，使马氏子弟都得以应试及第。这样，李介庵才有机会因马氏的保荐，捐官入川，在当地定居。到了李镛的父亲李璠，他不但做了一任县官，还购置了一些田产；但数量不多，留给后代的，主要还是他那本有些书卷气的《醉墨山房仅存稿》。只有到了李镛，辞官后才广置田产，还在戊戌政变前，买下正通顺街这座五进三重堂的深院大宅。

李镛觉得他的家业兴旺，是由于皇恩浩荡，只有按照皇帝定下来的规矩

办事，才能这样无愧于祖宗在天之灵。他盼望他的所有后代都按着他的规范兴家立业。他一向认为自己为官清明，深通礼教，特别还能写诗做文，这很使他有点自负；六十岁那年还曾印了一本《秋棠山馆诗钞》送给亲朋。他的原配夫人汤氏，是个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她的外祖母更是当年“兰陵三秀”之一，既能绘画又能作诗，还曾一度以诗画维持生活，自称“澹影阁老人”。所以这位汤夫人，真称得家学渊源，可惜天不假年，较早亡故，只在死后留下一些诗句和画稿。李镛的第二个夫人姓濮，也是江苏人，门第虽不及汤氏，却也不是一般妇女。她同样能吟诗，并留有诗稿，在李镛的“诗钞”里也不难发现她与丈夫相互吟和及寄托哀思之作。两位夫人为李镛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镛在前两个夫人谢世后，又讨了两个姨太太，为他带来一个足以做他的孙子的第六个儿子。

由于“书香门第”的传统，李镛夫妇给他们的大儿子李道河，也娶了一个知书识字的闺秀做李公馆的大房媳妇。这个媳妇虽从十岁起就跟着做官的父亲来四川定居，却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的一个县城里，她曾伴着她兄弟进私塾读了几年书，学名陈淑芬。她凭着聪明的天资和良好的素质，居然很早就与诗词结下了不解缘，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让这些诗词艺术陶冶了自己的性情。她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同情下人，而又豁达大方，深得翁姑亲朋的好评。当她嫁到李家时，公馆曾为这位大房媳妇进门演了三天戏，使整个正通顺街都知道了李家这件喜事，非同一般。果然，她进门第二年，就给她的丈夫李道河生了个面目清秀的男孩，也就是说，给李镛带来了一个足以为他家传宗接代的长房长孙。这就是巴金的大哥，奶名叫果麇的李尧枚。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李道河的官运并不亨通，快近而立之年，还一直在成都邻近的几个小县城里担任着知县下属的小吏，这使李镛常引以为憾。就在这时，陈淑芬却又为李家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封建家庭重男轻女。女儿太多不免成为伯叔婶娘们讽刺嘲笑的话柄。恰好那一年，李道河被派去当大足县的典史，专管监狱和捕捉盗贼的事情，每晚都要出去巡查，半夜才能回家，虽工作辛苦异常，却讨不了上司的欢心。因为他不善于见风使舵，鉴貌辨色，不久就被别人接替了自己的职位，最后只好回成都老家。这就更使长房在公馆里颜面无光。第二年，李镛花了一笔巨款，给儿子捐了一个过班知县。按照那时的规矩，捐官需送京城去，让朝廷点派的大臣验看他的风度、相貌和履历，才能确定他是不是能担任这个官职。哪知李道河虽然性情豪爽，平时很受朋友们器重，却并不为上司赏识。大臣才问了他几句话，就把他的申请“驳回”了。他在京城进退两难，处境尴尬，一封家信寄到成都，陈淑芬在李公馆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长房媳妇进门，许多双眼睛就瞧着她有没有“帮夫运”。李道河在京城申请“过班知县”被驳回，罪名不在上司的用人唯亲，也不怪李道河自己，而是在他的夫人缺乏好运帮夫。至少公婆、叔婶、妯娌是这样看待的。她由此受到挪揄，日子很不好过，只有对着她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暗暗掉泪。不久，火上添油，她那还不到四岁的大女儿，竟在她心神不宁的烦忧生活中夭折了。

李道河的第二个儿子尧林，和第三个儿子尧棠来到人间，真是及时。他们不仅给在大家庭中受困的母亲解了围，而且那时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华土地上出现：清朝皇帝想用“新政”来挽回王朝即将崩溃的危局，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尧棠出生的那天是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十月十九日，正是

他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这一天天气晴朗，像每个有阳光的冬日那样，叫人感到温暖又愉快。早晨，陈淑芬躺在床上，在朦胧中，想起黎明前那个奇怪的梦，禁不住嘴角挂上微笑。她记得醒来之前，有个观音模样的“送子娘娘”踏着轻盈的脚步，来到她的面前，微笑着将个婴儿交到她的手中，对她说：“这孩子本来给你弟妇的，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她把孩子揣在怀里，抬起头向娘娘道了声谢谢，然后低下头去看那婴儿，自己却醒来了……她像往常一样起了身，吃过早饭，从女仆袁嫂手里抱过来才断奶不久的一周岁多的尧林（奶名安麇），看她是不是把他喂饱了；然后来到三个大孩子尧枚、尧桢、尧彩身边，让他们围着她说笑。就在这个时候，她发觉自己的腹部出现阵痛，多次的经验告诉她：可能临产了。于是像所有当年做官人家一样，家里出现了忙乱：她被搀扶着重新睡到床上去，李道河赶紧派轿子去请医生，李镛则按着旧规点燃起香烛，求祖宗在冥冥中保佑全家安宁；接着是整个公馆里的人都在关心：长房里添丁还是弄瓦？

暖暖的阳光照在上房的窗前，它的脚步虽然缓慢，却并不停顿。时间已经过午了，好不容易，房间里终于响起一阵婴儿的响亮啼声，啊，一个男孩出生了，像他那两个哥哥一样，面貌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乳名升麇的李尧棠，后来成为作家的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此刻，在床帐里，他在想些什么呢？只见他睁开明亮的大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就是他那温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温柔的怀抱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暖和。

## 第二节在慈母的抚爱下

显然，母亲并没有辜负“送子娘娘”对她的托付，她本来对这个世界就倾注了热烈的爱，对她自己亲生的几个孩子的爱更是无法形容；而对于尧棠，则就更加爱逾珍宝。李家的长房住在公馆里的右上房，祖父李镛住的是左上房。尧棠就在这里经常被长辈和下人们怀抱着，从一个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被爱抚着，因为他当时最小，最受宠爱。他的大哥尧枚比他大七岁，他的另一个哥哥尧林比他大一岁，但他称这个哥哥为三哥，因为那时他的二叔也生了个男孩，比他大两岁，李家是大家庭，按着大排行的规矩，这样，尧林就是老三了。当尧棠自己会走路，虽然总还有大人带领着，但他就再也受不住大人过分的约束，欢喜跟着哥哥、姐姐们去各个屋子串门，特别欢喜穿过大厅和花厅，来到公馆右边的花园里，看重重叠叠的假山，看红红绿绿的花草，看飞来飞去的空中小鸟，和使池塘水面上出现明亮珠子的太阳。可惜的是在他四岁那一年，他不小心跌进了水池里，这事被祖父知道了，立即命人把水池填平。从此，这个花园就再也没有池塘了。

1909年，清朝宣统皇帝接位，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好不容易获得官府通知，可以到广元当知县。广元在嘉陵江上游，四川省的北边，靠近陕西省，离成都有四百多里路程，是个偏僻的山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对做官的人来说，并不是个肥缺。但李道河正在青壮年，血气方刚，觉得有个知县位置，总比闲在大家庭中强，这就鼓起劲头，带着自己家七口人，加上一直服侍妻子的袁嫂，和日常带领尧棠、尧林玩的杨嫂，以及小丫头香儿，老书僮贾福等一行，浩浩荡荡上路。当时从成都到广元，既无铁路，又无公路，只有靠乘船和坐轿。尧棠的母亲生过六个孩子，身体原不很好，这时偏巧又有身孕，沿途照料丈夫和孩子，辛劳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形容的。五岁的尧棠，对这次旅途生活，却感觉到又新鲜又快活，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高的山，那么宽阔的河面，那么多的树木。大概经过二十多天的路程，全家才到达了广元县城。

他们一家住进衙门里。那地方比成都老家还大。进去便是一块很大的空地，两面是监牢，零零落落关着一些犯人。接着便是尧棠父亲审判犯人的大堂，然后是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和桑林，以及养鸡放鸭的地方，算起来总共有六、七进。他们住在三堂，和在成都时一样，尧棠和母亲仍睡在一张床上。虽然不久他的第一个妹妹乳名广麇的李琼如出生了，这个妹妹就是至今健在的九姑，巴金同志家里和善可亲的“九姑”。但母亲还是和他睡在一起。每天一早醒来，他就看到母亲圆圆胖胖的脸，总是带着微笑，爱抚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跟着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到二堂旁边的书房上学，教书的是一位三十多岁年纪的刘先生，人很和善，从不责备他。他先教尧林、尧棠识方块字，后让他们读《三字经》，然后再读《百家姓》和《千字文》。刘先生还能按照书本画出各种人物、山水、花草和房屋。他在孩子们心中是个本领很大的人。他给大哥、二姐、三姐都规定了放学的时间，唯有尧林、尧棠例外，可以早些回家。下午放了学，尧棠总和三哥尧林由丫头香儿带着到四堂后面的草地上去玩。有时他们在桑树上采桑果吃，更多的时候是给公鸡和母鸡起名字，替鸡群排队，做各种游戏。有时看鸡斗，他恨凶狠的霸者，同情受欺压的弱者。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爱的大花鸡没有了，香儿说：“该是太太叫厨房里的何师傅抓去杀了！”尧棠就奔到母亲那边，恳求她不要杀

那只鸡，母亲微笑说：“那就叫他们换一只吧。”尧棠说：“这些鸡全是我欢喜的，你就不要杀它们吧。”母亲说：“那不行，是你爹爹吩咐了的。你快到厨房去看一下吧，迟了，那大花鸡便完了。”他又急忙跑到厨房里，果然，何师傅已在揩沾满了鲜血的刀，那只大花鸡已暈倒在血地里，扑着翅膀咽气了。他大哭着，回到母亲的怀抱里，母亲虽然笑着，喊他“痴儿”，但她并没有责备他，只抚摩着他的头发，给他安慰。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饭桌上端来了一盘鸡肴，别人吃得津津有味，而他却无法下筷。他痴痴地想着：“为什么做了鸡，就得被人杀着吃呢？”

那时节，一到晚上，母亲还给孩子们各人一本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她每天在这些小本子上，用娟秀的笔迹，端正地抄上一首词，那是按着《白香词谱》的顺序抄录下来的。她柔声地读着这些词句，并为孩子们讲解，让孩子们从幼小的年龄起，就接触到文学和音乐，引导他们的心灵走向艺术的殿堂。尧棠顺应着母亲的吩咐，按日背熟一首词，他当然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些词的意义，和作者的心情，但他从来不曾因为母亲这样的引导感到痛苦，他总是觉得在母亲身边读诗背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来到广元的第二年，尧棠的第二个妹妹出世了。这是母亲生的第八个孩子，她的乳名叫元麇。这时尧棠早由杨嫂带领着，到另一个房间和三哥尧林同睡在一起。那房间里还有一张床，是杨嫂搬来陪伴他们兄弟两人的。

杨嫂是个二十多岁的寡妇，在成都时就来李家做佣人。她很爱清洁，总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不许孩子们把它们随便弄乱弄脏。她经常半夜起来，为他们两兄弟盖被子；她还会讲故事，虽然内容荒诞离奇，有些不能叫人相信的地方，但还是经常吸引着兄弟俩，听了一个又听一个，成为他们每晚从母亲房间读词回来的余兴节目。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有个晚上，母亲忽然对尧林、尧棠兄弟俩说：“以后还是让你们的二姐陪伴你们睡吧，杨嫂病了。”说着，母亲和二姐就牵着他们兄弟两人的手来到他们的房间，把他们的床铺安顿好，然后二姐又把杨嫂的床铺换成自己的被褥，伴陪着他们躺了下来。二姐尧桢比大哥尧枚只小一岁，比尧棠大六岁，这时已经十二岁，对尧林尧棠说来，是个大姐姐了。她一直很体贴母亲的辛苦，经常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但她身体很单薄，性情也比较忧郁，经常有点咳嗽，这时母亲也吩咐她早些睡，兄弟俩却要求二姐代替杨嫂讲故事，二姐一口答应着，于是她把白天从《烈女传》中看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尧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觉得这些故事并不好听。

隔了好久，还看不到杨嫂来陪伴他们，兄弟两人对她非常想念。有一天下午，放了学，尧林对尧棠说：“我们去看杨嫂好吗？”尧棠立刻赞同，两人就悄悄地蹑到三堂右边女佣住的一个房间门口，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只见房间很乱，很暗也很脏，还闻到一股臭气。杨嫂躺在床上睡着，头发蓬松，脸色像一张白纸，桌上放着一碗药还不曾喝掉。尧林轻轻叫道：“杨嫂，杨嫂，我们来看你了！”杨嫂闻声，睁开眼来，见了他们，不觉拉住他们的手，不知是兴奋，还是乏力，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后来她慢慢地问道：“你们好吗？我病倒后，谁来照料你们？”尧林答道：“二姐陪我们睡，还有妈妈……”杨嫂又说：“这就好。我一直惦记你们，怕少了我，你们会吃苦。”她颤着声说完，伸出手去摸尧林的头，却把眼睛望着尧棠。尧棠哭了，他的热泪滴在杨嫂冰冷的手上，却讲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尧林把桌上的那碗药端了起来，说道：“药冷了，我给你拿到厨房去热一下。”杨嫂连忙说：“冷了不要紧，

千万不要拿去，给人家增加麻烦。”她把药碗从尧林手上抢了过去，咕噜咕噜地一下就把冰冷的药汤喝了下去。然后把空碗还给尧林，让他放回桌上，自己就一头倒在枕上，好像做了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疲劳得闭起双眼，发出微弱的呻吟。然后又轻声说道：“你们走罢，让别人见到，会说闲话的。”兄弟俩就走了出来。他们一出房门便见到香儿正在到处找他们。香儿说：“谁让你们来看杨嫂的？她有病，太太知道了要骂你们的……”她果然把这事告诉了尧棠的母亲，但母亲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认真地叮嘱兄弟俩：“今后可再不能去看她了，怕杨嫂的病会传染给你们。”从此，他俩再也不曾看到杨嫂，只听说杨嫂的病愈来愈重了，说她精神有点错乱，嘴里经常念念有词，也不知在说些什么，有时还发出一阵怪声叫喊。有一天，大家正在母亲房间里说着话，香儿忽然进来告诉说：“杨嫂在吃自己身上的虱子呢！她完全疯了！”听到这话，尧棠倒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母亲也叹息道：“杨嫂怎么会生这样的病呢？真可怜，她年纪很轻，就成了寡妇，她的心这样好，她对待你们，和我对待你们差不多，她是从心底里欢喜你们的。她怎么会生这样的病呢？她才二十八岁啊！听人说，杨嫂原有个三岁的孩子，杨嫂每月贴人家一点钱，寄养在乡下，后来不幸掉在河里死了，她连孩子尸首也不曾见到。”过了几天，母亲又说：“看来杨嫂的病不会好了，她连饭都不肯吃，怎么活得长呢？”她征得尧棠父亲的同意，把话吩咐下去：要准备一口棺材，木料要上等的。果然，没有几天，杨嫂就死了，消息传来，全家正在吃饭，父亲不觉放下筷子，母亲流下了眼泪，大哥、三哥、二姐、三姐也都心情黯然，尧棠更推开饭碗，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这是李尧棠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和悲哀。当然那时他还不曾体会到杨嫂的死，是有社会原因的；等到十年以后，他才逐渐理解到那是有一种几千年来就存在着的可怕的封建权势，无形中把这个青年妇女逼疯逼死了。

幼年时代的尧棠在广元县所看到的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景象，不仅使他感到恐惧，还使他的母亲感到不安。这就是他的父亲坐在二堂上，拍着惊堂木，审判犯人。说实在，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平时并不像戏曲舞台上那种鼻子上涂了白粉的奸官，当然他也不是旧小说中专替人家伸冤鸣不平的理想人物包公。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对待子女和蔼可亲，但为什么一穿上官服，坐到公案前，脸就沉了下来，俨然变成一个“青天大老爷”，别人都得向他磕头下跪呢！有时父亲命令差役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最后犯人还得向他三跪九叩，高呼“谢恩”。尧棠站在公案边，常常看得目瞪口呆，在他的脑子里浮现着许多问号，却长期解答不出。但是他父亲还是按着这个规矩，每隔二、三天升一次堂，升堂时总是先问这问那，问到后来，没有办法了，就拍一下惊堂木，厉声高喊：“给我拉下去打！”于是差役们拿起板子，按照他的吩咐，打到犯人身。有时还用一种“跪台盒”的刑罚，把犯人的手、脚、腿都捆在杠杆上，然后使劲抽紧，让犯人感到锥心似的痛，比打板子更可怕。有个晚上，犯人的惨叫让睡在三堂里的尧棠的母亲听见了，她对尧棠的父亲哀求说：“算了吧，人都是父母养的，哪经得起这样折磨？”父亲笑着说：“我何尝欢喜用刑，不过不用刑，他们不肯招，这些犯人很狡猾。”母亲说：“你这样做，不会发生屈打成招的事情吗？”父亲似乎很自信，但又疑虑了一下说：“不会的吧，今后不用死刑就是了。”在他任期内，确实不曾使用过死刑，后来连“跪台盒”的刑罚也不用了，但是还是经常打人板子。有一天，忽然打到管监狱的刘升和厨房何师傅身上。那是在过年的

时候，尧棠在门房里看到许多人在轮流做庄推牌九，参加的都是一些下人。尧棠看了一会，跑到母亲房里，母亲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到门房里看热闹。”母亲说：“有什么热闹可看的？”尧棠回答说：“他们可玩得痛快呢！一堆人摸着牌，又说又笑，还把银元推来推去。”正说着，父亲走进房来，就问香儿：“是哪些人？”香儿不敢多嘴，就说：“我去问一下。”当晚，父亲就派人去捉赌，结果不但把骨牌丢到厕所里，还把为头的刘升和何师傅几个人捉了起来。父亲这次非常恼火，说：“哪里料到赌场就在衙门内！那还了得！”就向差役下令，要他们把跪在地上求饶的刘升和老何各打五十板子。那些差役却迟迟不肯动手，因为都是自己人。父亲更加生气，拍着坐案，又厉声喊打，差役们这才不得不动手，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才总算勉强了结此案。

尧棠不了解他父亲在家里十分和善，从不骂人；为什么一升堂就对犯人动辄打板子。特别是这次，刘升与厨房何师傅都是尧棠平时接近的人，他们和他都很好，而由于他向母亲讲话时把赌博的事泄漏了，才使这两人挨了打，他心里不安，就跑去用好话安慰他们。他们却不计较，仍像往常一样，什么话都对他讲，这使他更加不理解。他逐渐感到一个人坐在公案上拍台子打人训人，和一个人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谢恩，是不能理解也很不光彩的事情。他把自己对父亲的两种不同面貌的怀疑，向母亲讲了。母亲说：“坐堂是件大事，你人小不懂，今后不要再去你父亲审案了。”虽然母亲这样说，尧棠还是经常去大堂看热闹，并继续到下人所在的地方去玩耍。好在母亲虽然只是叫袁嫂、香儿把他带领好，但是对尧棠和下人们在一起，甚至参加一部分轻微劳作，她是从来不管的。

尧棠觉得这些下人直来直去的谈话很有趣，也很亲切，倒是和父亲来往的那些长辈们，他们打躬作揖的礼节有些使人讨厌。那天，祖父生日，虽然祖父在成都，不在广元，但父亲还是摆起香烛，请安敬神。他们朝一只空的座位下拜，父母拜了不算，大哥、三哥、二姐、三姐也都下跪叩头；轮到尧棠了，尧棠躲在厨房里不肯出来。母亲派香儿来叫他，他出来也不肯下跪，说祖父人都不见，还行什么礼？母亲一向非常欢喜他，这次可被他激怒了。旁人也说这孩子越来越倔强了。母亲在众人面前放不下面子，就扬起鞭子吓他，他还是不肯服从。母亲只好把鞭子抽到他的身上，他穿着棉衣，其实并不很痛；真正感到痛的，倒是他的母亲。最后，他哭了，母亲也哭了。……

当然，母亲在平时是很温和的。即使他们兄弟有些过错，她也总是进行十分耐心的劝告，很少声色俱厉地责备他们。有一次，她听说尧林为了一件小事，把香儿骂了，还打了几下。母亲便找来尧林，对他说：“你怎么能搭主人架子？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谁也不能随便打人。”母亲见他低头不响，感到羞惭，就把语气转得温和继续说道：“现在你们兄弟俩都快七八岁了，不比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刚才我讲的道理，你要记住，你说说，你懂吗？”尧林想了一下，点头回答说：“我懂了，也记住了。”尧棠站在一旁，见三哥认错，他也很高兴。于是，兄弟俩就又把香儿牵着手到别处玩了。……

这样过了两年，尧棠的父亲李道河任期满了，在宣统三年，也就是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最后一年，他不再担任广元的知县官职，回到了成都。

那时尧棠已经七岁，经过在广元的二三年童年生活，重回老家，老家在他的心目中，现在又是一番景象了。

### 第三节经历了一场风波

尧棠回到成都老家，和他一起玩的人顿时多了起来。除了三哥，还有几个堂表兄弟，和年龄与他差不多的六叔。使尧棠特别感到有趣的是，家塾里十分热闹，读书的人比在广元时的书房多得多，有时父亲、二叔、三叔和五叔也来与教书的龙先生闲聊，还常常可以听到各种新鲜的消息。

那正是宣统三年的春夏之交，清王朝就要垮台。在四川，老百姓为了要求自办铁路，正在与清政府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这一天早晨，龙先生又像往常一样，向在场的大人发问：

“听到消息吗？”

“还不曾呢！——出了什么事啦？”大家不免好奇地问。

龙先生大概三十多岁，虽然当时他的脑后还拖着辫子，但比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已经剪了辫子而又在脑后装了假辫的二叔、三叔，还注意着时局的发展。清政府为了换取外国人的贷款，来维持他们的罪恶统治和挥霍无度的享乐生活，一方面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另一方面又同英、法、美、德四国银行集团签订了借款合同，把川汉铁路卖给了帝国主义，因此遭到老百姓的竭力反对。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号召四川人起来“破约保路”。龙先生非常支持这个行动，但他听到的是个不好的消息。他问大家：

“你们不知道吗？政府把王大人革职了！”

“王大人”就是当时的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他因在成都亲临民办的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看到会上群情激昂，认为“民心不可违”，曾上奏劝请清政府悬崖勒马，不料反被清政府认为“软弱无能”，竟被撤了职。

“我看这事情只会愈来愈僵，”龙先生说道：“不信，你们等着瞧吧，难道老百姓好欺侮的吗？”

果然，隔了一个多月，龙先生又传来消息，说因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保路运动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发展成了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还宣布不承认清政府的一切外债。赵尔丰已经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十个代表，并搜查了川汉铁路公司，激起了成都市民的愤怒，他们高举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游行赴督署请愿，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射击请愿群众，当场打死了二十多个人。李公馆里的人还隐约听到一些枪声……

一连几天，赵尔丰发布了戒严令，城门都闭了起来，局势好像安定了。但龙先生却告诉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有人发现：同盟会里的革命党人深夜越城，在成都城外的农事试验场，用数百片木板，写了字，把它投入锦江，让下游的各州县都知道成都发生的事，现在各州县都在响应，看来要出大事了！”

龙先生的预料没有错，1911年9月25日，锦江下游的荣县宣布独立，由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建立了辛亥革命前夕由同盟会领导的第一个县政权。它比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

政治局势的急转直下，对当时只有七岁的尧棠来说，当然理解不深，但对暴力要反抗，对丑恶要鄙弃，这时他已开始有所意识。他分明记得当时学馆里的龙先生天天用激动的声音向大家叙说川汉铁路的情景。在另一方面，使尧棠感到遗憾的是当时他自己的脑后还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要母亲或女佣来帮他梳洗，他觉得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

尧棠记得这年旧历十月十八日，是他那已故祖母汤夫人的冥寿，祖父和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为祭祀的事情忙碌着。黄昏的时候，父亲正准备带领全家人到祖母像前磕头，一个仆人忽然进来，说是外面发生了兵变，街上发生了抢劫，银行也被占领，据传附近的二伯父家也有士兵进去骚扰。（二伯父是父亲的堂兄，李家按大排行称呼，所以也有人称尧棠的父亲为“三老爷”）原来四川各州县纷纷宣布独立，四川总督赵尔丰见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就将政权交给立宪党人，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抵制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军。但是他这一行动为四川人民所竭力反对，军队内部又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久，这个“大汉四川军政府”内部就发生了这场兵变，成都的社会秩序一时大乱。

一听到这兵变消息，李公馆空气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全家安全，尧棠父亲把祖父安顿到一个亲戚家里，并疏散了各房大人和孩子；然后又叫母亲把尧棠兄弟姐妹带到外婆家，留下他自己与大哥尧枚守在家里。到了深夜，果有一批变兵来敲门。父亲吩咐十几个堂勇和三叔的两个镖客，身佩长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守卫着，所有马夫、轿夫、男仆、厨司都作后备，分守大厅、堂屋、厢房、后园等处。大门终于被变兵撬开了，进来了十几个人，起初声势汹汹，后来发现二门外列队站着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又都荷枪实弹，就立刻改变口气，说没有什么别的意图，只不过想回家乡去，借些路费。尧棠的父亲拿出一叠银元，用纸封好的，恰好一百元，对他们说：“弟兄们有困难，这点小意思，你们拿去用吧，还谈什么借不借呢？”这些丘八爷就这样被打发掉了。

尧棠他们跟着母亲住在外婆家，同样受了一整夜的惊吓。他们熄了灯挤在外婆的卧室里，屏息静气，等候动静。忽然听到一阵枪声，外面天都变红了。接着又听见一阵吆喝和哭闹的声音，舅舅进来说是邻近的公馆遭到抢劫。外婆一边念佛，一边劝母亲赶快躲避，母亲则要求外婆先走，外婆坚决不肯，却让舅舅搬了梯子，帮助尧棠一家爬过墙去，到一个管菜园的老婆子家去坐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局势看来平静，母亲带了尧棠先回到公馆，看到父亲和大哥，虽然只过了一个晚上，却像隔了几年一样，且喜大家平安无恙，总算把这个难关度过了。原来成都这场兵变，最后由同盟会员带领革命军把它平定，并成立了新的“四川军政府”。直到这时，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才终于宣告结束，辛亥革命在四川得到胜利了。

“你们听到消息吗？”不久，龙先生又在李公馆的书房讲新闻。这次他比任何一次都兴奋，而且高兴得几乎要掉下泪来：“革命军冲进了督署，把赵尔丰当场擒住，还游了街，杀了头，头挂在城门口！”

尧棠听了这个消息，好像亲自看到那个专门与人民作对的赵尔丰被捉，被反绑着游行，最后被斩首示众。他感到非常新鲜，也非常兴奋。最使他高兴的是，男仆姜福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同意，把他和三哥尧林的小辫子都剪了，他们和二叔三叔一样，脑后都不再有那个讨厌的东西了。隔了不久，全家的男人、男孩也都把辫子剪掉，最后，连一家之主的爷爷，也不得不把辫子剪了。。

二叔原是个秀才，在日本留过学，学的是法律，回国后，戴过红顶子的官帽，还曾由皇帝“特命”，担任过有“道台”称号的四品官，在家里比谁的“身价”都高，所以换了朝代，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幸而他古文根基很好，学的法律知识虽称不上怎样精深，但究竟是我国第一批法科留学生，请

教他的人还是不少，他便在公馆里设了个律师事务所。三叔也去日本留过学，回来曾在南充当过知县。他的为人不像二叔那样持重，那样循规蹈矩，清朝皇帝垮台，他曾替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称号，吟诗抒怀；后来大概发觉这个称呼太不合时宜了，就换了个“息影龠主”的笔名，一边在二叔的律师事务所做帮办，一边还在当地一个法政学堂挂了个名义，把自己从国外学校带回来的讲义译成中文，“批发”给国内学法政的学生。他的性情急躁，稍有不遂心，就暴跳如雷，碰上三婶和他的脾气差不多，因而有时闹得家里天翻地覆，寝食不安。

至于尧棠的父亲，他弃官回家，本来已无意于仕途；现在却反而忙碌起来。大家庭的事，原由祖父作主，具体却要他总管。他交游广，外面商业场各行各业凡是他们家有份的，董事、股东名义统由祖父挂着，事情却都得由他出面去做。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又有做过知县的身份，人家都尊重他。他一听到“逊清让位”的消息，就在家摊开一块洋布，带头取剪刀，拿针线，做起新的国旗，准备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

最兴奋的还是尧棠他们这一代，特别是大哥尧枚，他希望有一天能进新式的学堂去念书。果然，不久他得到爷爷的开恩，终于进中学读书去了。

民国成立，热闹了一阵，风波过后，世道却并不曾有什么大的变化。不说别的，单是李公馆，有客人来，大门打开，看门人迎客仍要半跪伸手，向坐在轿子里的客人索取名帖；每个晨晚，不管刮风下雨，儿孙们仍要到上房去向祖父请安，只要祖父咳一声嗽，下人仍要心跳几下，似乎一切都不曾改变，李公馆的老爷、少爷、太太、少奶奶们出门去，一个人坐轿，还得几个人抬他们；尽管也有像尧棠的母亲那样体恤下人，主张不要动辄打骂下人的主子，李公馆里还是有被赶出去当乞丐的佣人；还是有被放在石板上、盖一条破席而病死的老仆；还是有被诬陷为窃贼吊死在门梁上的轿夫。

#### 第四节第二个“先生”

尧棠八、九岁以后，在家里有了较多的自由。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大人跟在他的后面看管他了。当初在广元经常带领他们玩的那个小丫头香儿，这时已经生病去世。现在，他每天从学馆龙先生那边放学出来，就可以到各处走走；有时跟年龄相差不远的一些堂表兄弟一起；有时则连尧林也不在一块，他可以独个儿到各处看热闹，有时到门房，到天井；有时到大厅，到花厅；有时到后面的厨房里去聊天，甚至还可以到公馆前面最西边角落的那几间用篱笆隔成的小屋里，去看看在那里吸大烟的轿夫。那几间狭窄的破屋子，原来是养马的马房，后来改为轿夫驻足的地方。屋子很暗，因为没有窗子，全靠篱笆外面透露进一些阳光，把屋子照亮，一到阴天，就更加阴暗，晚上，则常常是在烟灯旁，才能相互见到各人的脸。尧棠正是在这种情景中，经常听轿夫们的谈话。

轿夫在李公馆里，恐怕是属于最低层的下人。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有的是从附近轿行里招进来的，本来就不属于李家雇用的佣仆，晚上大都回自己家去住，有的原是公馆里的马夫，现在主子不骑马了，就随着主子代步改用轿子而变成了轿夫。每顶轿子的轿夫，基本上是固定的，哪一房的轿子，就有那一房的轿夫，很少互相顶替。而每一房的轿子也不只有一顶，因此，李公馆的轿夫，多的时候就有三、四十个。轿夫人多，就更不值钱，看住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公馆里的地位。他们的住房暗无天日，这还不算，就是厨房也与其他人分隔两处。他们的厨房在马房对面，跨过天井，便是他们的灶间兼饭厅，也是又暗又湿。轿夫们白天累得像一群卸了鞍的牛马，精疲力尽；一到晚上，许多人为了提精神，只好躺在烟灯边抽大烟。那时吸大烟成风，有一些原先年轻力壮的轿夫，吸烟成瘾，最后也成为骨瘦如柴的鸦片鬼。他们有的是在李家几十年的老脚夫，有的则是闯江湖多年，社会阅历丰富的流浪者……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尧棠对他们非常熟悉，经常听这些人倾诉社会对他们的不平，当然也包括这个大家庭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这些人也不把尧棠当作外人，从不顾虑他会把话传到老爷、老太爷耳里去。

就在这样环境里，尧棠在母亲之外，又有了他的第二“先生”。这就是轿夫老周，他脸孔黝黑，身体瘦弱，抬起轿子来却还双腿劲健，不输青年同行。他本来是四川平原一个小村庄里的农民，生活困难，在外面流浪，二十多年中，他走过许多地方，干过许多行当，那些最低微、最被人瞧不起的活，他都做过；最后狼狈不堪地回到成都，到李公馆来充当轿夫。每晚他躺在那间马房里，让一些年轻的同行围在他的烟灯旁，听他谈东说西，讲不完的各地风俗、各色人物，以及朝代盛衰，人间沧桑，……

尧棠看这个躺在破床上的轿夫，觉得他与别的轿夫不一样，讲的故事有头有尾，而且很新奇，以后就与他亲近起来。老周常常让尧棠站在他床边，把自己过去的所见所闻讲给尧棠听。尧棠觉得老周讲的故事，不但新鲜动听，还有不少是值得动脑筋细细想想的。

“虽然世道艰难，但我们做人，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老周在讲了一些往事，又诚恳地说道：“人要真实，不能骗人，也不能亏负人，更不要占人便宜。”他还对尧棠说：“我不光是抬轿子，为人代步，其它事情也一样，只要对人有好处，让人家踏着我的身子走过去，我也愿意。”

这个年老瘦弱的轿夫，他受到社会多少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还坚持着

自己的信仰：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忠实地生活。他在尧棠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在尧棠的童年时代，成为尧棠的一个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教师。他使尧棠在这个年龄，就感觉到了越富足的人越吝啬，越不宽裕的人越慷慨。

有时老周在灶间烧饭，尧棠就穿过天井来到灶头边观看。有一次，尧棠竟然也坐到灶门前，拿起火钳帮他把柴草不断地向灶洞里塞进去，结果火反而被他弄熄了。

“不能这样！”老周笑着走过来把火钳从尧棠的手里接了过去，然后在灶洞里通了几下，和蔼地对他说：“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尧棠一边听着，一边向灶洞里瞧，果然发现火又旺盛起来了。

## 第五节母亲和二姐的死

1913年,即民国二年,尧棠的母亲陈淑芬生了她最小的一个孩子尧椽(开麀)以后,健康情况就逐渐变坏。她嫁到李公馆,前后不过十七、八年,却生了九孩子,平均每两年为李家增添一个人口。这当然非常符合李氏上代祖宗“多子多孙”愿望的。但她自己的青春,却为多子女而作出了牺牲。她性情温和,举止文雅,既追求“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类带有伤感成份的诗词的美感意境,也很自然地承受了诸如《烈女传》之类封建故事的影响。她的善良,使她体恤下人,关怀他们的冷暖,丫环出嫁,给她们添衣送被;佣仆患病,给他们请医抓药。她对子女慈爱而作出自我牺牲更是不用说的了。她来到李家,几乎有一半的年月是在怀孕期中;而所有的年月都倾注在对子女的抚爱与教育上。

民国三年七月,那是一串使人难忘的闷热不堪的日子。尧棠的母亲病倒已经二十多天,她白白胖胖的圆脸变成又瘦又黄,显得十分憔悴。尧棠并没有意识到抚爱他哺育他的母亲就要离开他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不时的跑到房间里去看母亲,回答母亲的各种问话:“饭吃过了吗?添一碗没有?”“到什么地方去玩了?他们在做什么?”“功课做好了吧?书背熟了吗?”“澡洗了没有?衣服太脏了,该换一件吧!”……他站在床边听着,随时回答母亲的这些提问,仰着头看看母亲的脸色。他觉得母亲瘦了。隔了几天,他又看见母亲还在为着大哥的亲事操心,为大哥订婚时准备聘礼,吩咐大哥到亲戚家去借金镯。又过了二、三天,母亲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只能简单地吐出几个“嗯”字。后来,她连摸他的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身子不能动弹,脸部显露着痛苦的表情,两眼含着泪水望着他。十岁的尧棠还没有意识到,他的母亲将永远不再能温柔地摸着他的头,向他微笑着轻轻地讲话了!他和尧林睡在母亲的隔壁房里,这一夜,他还像往常一样,和尧林一起从母亲房里出来,由袁嫂带他们回到自己房间去睡。尧棠只知道母亲病着,病得不轻,他心里有些黯然。兄弟俩睡在一张床上,悄悄地不多讲话,唯恐惊动母亲,但还是以为明天早上可以去看母亲,向她请安,问她好些没有。母亲是永远在的,他们出生以后就有母亲,母亲是不会抛弃他们的,在他们的小脑袋里从来不曾把母亲和死联系过。

然而,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一日早上,当他们从梦中醒来时,就听见一种不寻常的动乱的声音传进来。先是父亲与大哥的唏嘘,后是二姐、三姐的哀哭,接着是几个大汉抬重物的声音。原来安放母亲遗体的棺材都已经被人抬进来了。啊,母亲竟在昨天深夜撒手离开人间了!尧棠跟着三哥尧林急忙起床,含着热泪看到这些景象,一时还来不及完全意识到在他眼前发生的这场巨大的变化。他好像觉得母亲还在他的身边,他还在她的怀抱里。他看见她梳着光滑的头发,穿着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慈蔼的圆脸上洋溢着微笑,对着他轻柔地讲话;他又好像看见她正坐在方桌旁,在孩子们的一本本小簿子上,用娟秀的笔迹抄写《白香词谱》,然后用她动人的声音讲解给他们听;他又似乎看见他们在他们睡觉时,轻手轻脚地走过他的房间,到养蚕房里给蚕子添桑叶;他又听到她用忏悔的声音,向他讲她不该打一个贪嘴的奶妈,虽然这是她生平仅有一次的打下人。他听母亲说:“人都是同样的,不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要爱一切人。”

母亲去世了,但母亲并没有在他的面前消失。他一到母亲房间里,就情

不自禁地喊起“妈妈”来。啊，妈妈是不能失去的，但妈妈到底在他的眼前不见了。大殓的时候，他见到棺材被放在西厢房斜对面的签押房里，母亲静静地躺着，苍白的脸失去了青春和微笑。许多人在她的周围哭喊，还有人正在把准备好的红绫盖上去。这时，屋内一片哭声，谁也不知什么时候，棺材被盖上，并且钉牢了。

尧棠擦了擦泪，抬起眼，只见二姐和三姐还伏在棺盖上大哭着，她们把头撞在棺木上，抗议家里人把母亲隔离在棺材中。她们比尧棠大五、六岁，已经完全知道失去母亲将是怎么一回事了。一到晚上，尧棠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灵堂里哀哭，他不禁也在房间里抱着三哥尧林的头哭了起来。他非常同情两个姐姐，他知道她们的生活是和母亲的生活紧紧联在一起的，她们同样也不能离开母亲，母亲的死，对她们是个多么大的打击。特别是二姐，在大姐死后，她是母亲的长女，母亲对她，有比对儿子和其他几个女儿更殷切的要求，这就是希望她能更像母亲那样做人，做一个既懂诗书又谙家务，必要时还能勇于牺牲的人。她从小跟着母亲读诗背词，还能做针线活，又最能体贴母亲在大家庭中做长房媳妇的苦处。她似乎很早就成熟，在广元县，当杨嫂患病，不能再带领尧棠和尧林时，她就接替了杨嫂，把自己的床搬到他们的房间里，伴着他们睡，代替杨嫂给他们讲故事。她和三姐差一岁，回成都后，她们两个人睡在一起，房间里有一本《烈女传》，那是爷爷指令她们读的，也是学馆里给她们读的课本。从这本书里，她们学到了许多封建的“妇道”，作为妇女，她们要忍受一切，顺从一切。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尧棠听姐姐们说过，那是她们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宫里起火，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他父亲尸体。两个姐姐性情温和，很像母亲；但熟读了这样的书后，显得与她们的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寡言，有时甚至十分忧郁。特别是二姐，她的身体，本来在广元就已经十分单薄，一回到成都，到了秋凉季节，就不断咳嗽，有时还发现潮热，人逐渐消瘦，中医一直治不好。有一次高热不退，几天下来，神志都昏迷了，多亏母亲请了四圣祠医院的英国女医师来，给打了针，服了药片，才把她救了过来。医师说，二姐患的是肺结核，中国人叫它作“女儿痨”，这要很好的调养，还应注意心境愉快。祖父和父亲却不相信西医，他们很怕洋鬼子，但又轻看洋鬼子，认为对外国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母亲却悄悄地与那几个英国女教士结交，经常来往，还带着尧棠到医院玩，使尧棠有机会第一次认识外国朋友，对她们送给母亲的《新旧约全书》中文译本很感兴趣，虽然他当时并未读它，只觉得这本书的皮面精装，与中国的线装书完全是两种不同装帧，因此印象根深。

二姐服了西药，病有些好转，不幸的是母亲的死给了她一个很大刺激，悲伤加重了她的病情，她的身体更加消瘦了，有时连饭也吃不下，咳嗽却不停。一个月的丧事过去，她已经不得不经常躺在床上。可是母亲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去请四圣祠医院的西医来为二姐诊病。父亲只相信中医，而中医那时对肺结核的治疗是没有办法的。二姐十六岁的生命，像一盏少油的灯，渐渐地黝黯，就要熄灭了。

虽然封建大家庭的变化十分无情，但一切仍要按照它的旧规矩、旧礼制办事。这个家庭以太爷为主子，当然什么都得听他的，一切活动都得围着他转动。母亲在七月里去世，全家悲痛之情未已，而当年十一月里祖父的生